

# 終朝采藍

古

名

物

尋

微

◎ 扬之水 著



終朝采藍

古名物尋微



附之水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扬之水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1

ISBN 978-7-108-02858-7

I.终… II.扬… III.出土文物—研究—中国

IV.K8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9976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面题字 孙晓云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6-416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

字 数 200千字 图片 415张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65.00元

# 序

## 作为诗的物与作为物的诗

与杨之水初识于探访福建窑址的路途中。沿途聊些身边人物，考古故事。感觉她为人真挚，博闻，好问，图画得好，笔记精微。回来发现她写作速度惊人，每次见面送给我一叠新作，说的都是古人生活中的寻常物用，文字间流露出一种纯粹的古典韵味，淡雅，深致。后来她让我为她的新文集作序，理由是，每篇都认真读过了，而且能坦率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作研究生常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但从没听说是写序的理由。我珍惜这份浓厚的友情，也知道她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就答应下来这件自知不可能做好的事情。

### 一

书里的篇章考证古诗文名物，内容从先秦到明清，而多宋人故事，或从文到物，或从物到文，或是风俗故实。文笔是她一贯的风格，行云流水般，气韵淡远，好像更无我。偶尔幽默一下，意趣横生，令人惊喜。视野广博，考证精深，又举重若轻，了无痕迹。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读来

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

习惯了演绎推理，总是认为，大概在寻常物用后面有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贯穿始终。于是仔细研究，欲寻找树叶后面的“枝干”。但扬之水自己说，写这些题目，好像低头拣起一片树叶，然后就开始琢磨，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最终抬头找到树，也可能没找着。我想，这意象很美，因为拾起的片片落叶皆是诗。明亡的时代，常见一种青花碟子，只画一片写意的秋叶，边上写着“落叶无声”，或者“一叶知秋”，我一直都没弄明白它的来历，有时就是这样，叶子还在，树没了。

书中对文房清玩细致的描述里，蕴涵着一个长时段的物质文化变局对生活体验和审美趋向带来的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这大树的主干便是生活姿态与家具的变化，——居室陈设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从跪坐向高坐具的转变，宋人已有自觉，<sup>1</sup>而扬之水通过对寻常器物的追本溯源，探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牵动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由此枝繁叶茂，导致文化传统的变迁。回头再看，“明窗净几，罗列布置”，“鸟篆蜗书，奇峰远水”，“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赵希鹄《洞天清禄》序），宋人笔下的人间清趣是在历史舒缓的潜流中悄然涌现。

有时候，就是用心说一个小事情，看半天也寻不着什么大格局。然而，日常起居，形体姿容，到扬之水笔下，就多了一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令人在意想不到而又寻常不过的地方与古人不期而遇，妙趣顿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经国大业能于此间切入。这般“错落落落的精致”，倒让人宁愿“一叶障目”。

宋人把这种对平凡琐事的关怀追溯到唐人张彦远，赵希鹄《洞天清禄》开篇即说到这

1 苏轼《四十策》；朱熹《跪坐拜说》；陆游《老学庵笔记》；见柯嘉豪《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四分。关于身体仪态与文化的关系，见 Mauss, Marcel 1979 The Notion of Body Techniques. In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Essays*. Translated by B. Brewster. p. 97—123.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位遍览天下珍藏，作《历代名画记》的作者，还写过一本《闲居受用》，记述身边平凡生活点滴，所谓“至首载斋阁应用，而旁及醯醢脯羞之属”，虽然作者既而感叹“噫！是乃大老姥总督米盐细务者之为，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因别立鉴古一项而曰之为“清福”；不过依着张彦远自己对气韵的讲求，——“若气韵不周空称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想来《闲居受用》中的丛脞“细务”也是写平淡中的意韵，而宋人的“清福”未尝不是与此“细务”之意韵相衔。此后许多谈物的作品，常是国破家亡，物去人非之后的追忆，亦多系于“醯醢脯羞之属”，至深的哀恸，竟也是寄寓于对平凡细物的不舍和依恋。

## 一

扬之水的名物新证承袭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物，说到诗与画的世界。因为同行亲历，我想还包括实地勘察，对古今之变发生的场景有身临其境的感知，足迹超出了周去非、赵汝适所熟识的世界。

研究的核心是定名与相知。定名源自考查古籍中提到的草木鸟兽鱼虫的名与实，进而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与用途。古书中对自然的细致分类保存着我们模糊的历史记忆，——在混沌的世界中建立规则和秩序，曾是一个多么漫长艰难而生死攸关的事。<sup>2</sup> 文物风俗典章制度中则蕴涵着古人的观念和理想。当承载它们的物随着岁月尘封而湮灭，就不得不再去穷究名与物的关系，恢复久已离散的语境。

名物研究本来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不过一直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对物本身的觉醒与兴致，却是宋人的风尚。在刘敞、欧阳修的倡导之下，北宋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对古器物进行系统的收集、描述和研究。<sup>3</sup> 文房空间的变化“使精致的雅趣有了安顿处”，宋人的疑古思想

2 Anna Pavord 2005. *The Naming of Names: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World of Plants*. 《名名：在植物的世界中寻找秩序》。New York: Bloomsbury.

3 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金石录》，见卷十二。

也为对物与文的双重关注开启了探索之源。

时风好古，北宋文人在他们的金石考古著作中就先讲明白：古器“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金石录》序），或“非敢以器为玩也”（《考古图》），更重要的是可以“决经义之疑也”（《金石录》卷十三《爵铭跋》）。疑古，所以对史籍书写和流传过程有更清醒的体察“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sup>4</sup>虽然说“刻词乃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可“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刻词本身也就不可能不失其实。证据是，在北魏郑文公碑上，赵明诚看到郑道昭在远离都城的摩崖碑文中隐去了朝廷因为其父治阙廉清而加的恶谥。他觉得不可思议，但并不肯因为碑文乃当时之物而否定史籍之详。<sup>5</sup>我想，大概他已经把那些秉私意、失其实的古籍和金石都当作更广阔的历史的一部分了吧，宁可求同存异，也不轻易厚此薄彼。

宋人金石考古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给古器物定名，——名物学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持“物”以找名，<sup>6</sup>乃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王国维语），扬之水并不泥于古人对名与物的对照考查，她的求新之处在于关注的是诗文和器物间的契合，尝试“在二者的遥相呼应处，接通它们本来应有的联系”，<sup>7</sup>由此，使物在诗中的生命于两者的契合处复活。

此即所谓“相知”，——从释读文物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开始，达到“与古人有会心之妙”<sup>8</sup>。考证翔实，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会心之妙还要依附于情和韵。有一位读者说得非常好：“说起来，‘相知’大概算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了，研究者和研究的客体如果可以达到相知和互通的境界，这门学科也就有了灵魂。”这份相知，使人尤思宋人。他们用很重的文思来考古金石，吕大临说“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考古图》）。一句“如见其人”，物中的人情，呼之欲出。

论考据翔实，科学方法，宋人或不敌经历了乾嘉学派和现代考古双重熏陶下的今贤。

4 《金石录》序“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乃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5 郑文公碑，羲卒，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为文灵，碑上说加谥为文，而传载赐谥诏书甚详不应差误，而碑当时所立，必不敢违其一字，皆莫可知也已（《金石录》卷二十一）。

6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

论灵气才思，北宋金石人物，如刘敞，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之属，却可以说是陵跨百代。对此仍是王国维的评价最为贴切，他说，北宋金石学中的“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sup>9</sup>北宋金石学在靖康之难之后迅速衰落，虽然清代复兴，考证也远过于前代，然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

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道出宋人金石之美的极致和传统之流中间最富生命力的特质。我更倾向于认为，扬之水文章秉承了金石学的精神内涵。在一种进化的思路中，大家关心的是金石与考古是否有继承关系，和金石学的局限性，而不太关心金石学的精神内涵和源流，以及考古学的局限性。我想，正是观堂拈出的所谓“兴味”，以及思古之情和求新之念，使扬之水孜孜不倦于名物之学，而与古人相知吧。当我们日渐依赖以科学方法探索这个文明的历史，这种相知显得那么珍贵，——没有它，我们如何体味点点滴滴中久已湮灭的诗意呢。

李 旻

于安娜堡

7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页5—6。

8 孙机《诗经名物新证》序。

9 在《城子崖》序中，李济也谈到情与史的兼容：“治史学的人，并不一定要抑制感情，二者的结合是个技术问题，技术高的史学家就能把他的感情贯注到真实的史实里。”然而此情非彼情。李济说的情是民族感情，在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的关系下，考古学在中国几乎一诞生就面临着很重的民族使命，这与北宋金石学发生时的那种从容自觉的情境颇不相同。不过，时势异也，两情相较，将无同？



# 目 录



|                  |     |
|------------------|-----|
| 序                | 5   |
| 唐宋时代的床和桌         | 2   |
| 行障与挂轴            | 28  |
| 宋代花瓶             | 42  |
| 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       | 74  |
| 雷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 | 108 |
| 宋代茶角             | 120 |
| 笔筒、诗筒与香筒         | 132 |
| 提匣与行具            | 140 |
| 名刺、拜帖与拜匣         | 160 |
| 砚山与砚屏            | 182 |
| 熏笼与手炉            | 198 |
| 摺叠扇              | 214 |

|          |     |
|----------|-----|
| 十八子      | 222 |
| 剔牙杖      | 234 |
| 领边秀      | 242 |
| 三清茶与三清茶瓯 | 252 |
| 春盘       | 258 |
| 五月故事寻微   | 266 |
| 纸被、纸衣及纸帐 | 278 |
| 杨柳岸晓风残月  | 284 |
| 一花一世界    | 294 |
| 后记       | 352 |



终朝  
采  
蓝



---

唐宋时代的床和桌

---



## 小引

由席坐而转为高坐具上的垂足坐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中的一次大变革，虽只是家具的增高，但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变化却很大，比如观念，比如生活习俗乃至礼俗种种<sup>1</sup>，甚至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一番变革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经过了一个持久的过渡。

中国古代建筑以框架结构体系为主，且以此贯穿始终。在框架结构中，任何作为空间分隔的构造和设施都不与房屋的结构发生力学上的关系，因而在材料的选择，形式和构造等方面都有完全的自由<sup>2</sup>。先秦时代的室内布置便是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完成。其时家具简质，却极有灵活布置之便，也因此而临时性的设施为多，支撑室内陈设的，下为几与席与床；上为幄，帟，幕，帐；中为扆。日常活动，在室内便以坐席为中心。王及诸侯临时的听政与休憩之所，则根据需要，用这些可以随时移易的设施布置于上下左右前后，而用“扆”隔出一个“尊位”来。可以说，家具的灵活是和建筑结构亦即室内空间分隔的灵活一致的，当日生活习俗和礼仪的框架与主干，也便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汉承先秦，基本原则没有很大的改变，只是使席坐时代的家具不断完备与成熟。比如几案之类。有置于帷帐之前的长案，时或延续先秦已有的名称而呼作枱。枱的上面可以更置食案。食案也还可以细分，如无足而方者曰几，有足而圆者曰几。枱，其上又可置书几，或书案、奏案。此类小巧的几案多半下置枱足，几面两端或又作出翹

1 家具增高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便是坐姿的改变：由跪坐而易为垂足坐，亦即旧日为人所鄙的踞坐。佛教被人接受，踞坐却很难通行。宋文帝时郑道子与沙门书，论踞食的简慢，以其不合中土礼俗也，即“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敛衽十拜，事非偏坐所预”，由此引起一番很是激烈的辩论，与者甚众，最后甚至由司徒王弘以及朝臣奏请宋文帝裁定。事见《弘明集》卷一二。又僧众踞食形状，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食坐小牀”条云，“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牀，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卑幼之流，小拈随事，双足踞地，前置盘盂”；“未曾见有于大牀上踞坐食者”。



头。体量较大的栅足案则陈设于地，多用作置物，其上不妨更陈篋笥乃至柜和橱。属于坐具的隐几或曰凭几，几面多下凹而成一柔和的弧度，其下也常以栅足为支撑，这也是先秦已有的做法。此外汉代又从作为卧具的床中分化出小于床的榻。榻与隐几，便成为日常起居中最为经常的组合，并且以此表明身分，——它常常是尊位所在，这时候室内陈设的中心，因此也可以说是榻与隐几。

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佛教东传而为席坐时代稳定成熟的家具形制带来了若干变革的因素，而此前已经出现的来自西域的胡床，更成家具变化中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传统家具中，席与屏风，也包括各类帷帐，都是可以折叠、方便移动的，胡床的迅速被接受，可折叠而便携，大约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南北朝时，胡床用于军中的事例有不少，戎服垂足坐胡床，自然既舒适又方便。《梁书》卷五六《侯景传》所谓“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条史料，此中之要，一在“著靴”，著靴则传统之跪坐难行也，而这里的“床”，原是起居处的尊位所在。侯景之“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乃是在尊位上另设坐具，而为着著靴垂足坐的方便，但却大反传统礼俗，它被写入正史，也正包含着对此特别的惊异与批判。

## 一 唐代的“床”

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不妨以陕西三原唐李寿墓为例。墓葬年代为贞观五年，即公元六三一年。墓中置石槨，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寝殿。石槨内壁满布线刻画，茵褥、隐囊、挟轼、筌蹄、胡床；食床、

2 李允铎《华夏意匠》，页165，中国建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暖炉；棋局、双陆局<sup>3</sup>，画中侍女捧持的诸般器具，表现了当日贵胄家居生活之一般<sup>4</sup>，而家具的时代特征正由此见得鲜明，那么把它作为与后世便于比较的一个标识，也大致合适。

这一时代的家具中，最为特殊的一类是所谓“床”，换句话说，即床的概念变得格外宽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它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

比如作为尊位的坐具。《资暇集》卷中“座前”条：“身卑致书于宗属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于床也，言卑末之使不当授受，置其书于所座床之前，俟隙而发，不敢直进之意。”作者李匡乂是唐末五代人。床作为尊位之坐具原可上溯到东汉及南北朝<sup>5</sup>。尊者“座于床”的情景，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很常见。《太平广记》卷三〇一引《广异记·仇嘉福》：“唐仇嘉福者，京兆富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少年欲与之同行，而引其入华岳庙，“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幕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牀，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所谓“贵人”者，太乙神也。又《法苑珠林》卷六四引《冥报拾遗录》：“唐范阳卢元礼，贞观末为泗州涟水县尉，曾因重病闷绝，经一日而苏，云有人引至府舍，见一官人过，无侍卫，元礼遂至此官人座上，据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头，一手提脚，掷元礼于阶下。”是牀在阶上也。两则均为初唐故事。又唐末皇甫氏《原化记》中的“车中女子”，曰一入京应举的书生被两少年强引至一处，“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而后有女子乘钿车至，“遂揖客人，女乃升牀，当局而坐”。此车中女子，原是一位很有侠气的贼首。几则故事中，除竹倚牀和绳床是椅子之外，余之言床者，均是作为尊位的坐具。以唐五代绘画为比照，这里的情景便很容易明白。如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

3 有关的详细考证，见孙机《唐·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页205—212，《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4 它在生活中可能的情景，以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校书图》为参照，可得大概。

5 东汉图例，如山东安邱韩家王封村汉墓发现的画像石，见《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三期封三。后世之御牀，即由此发展而来。《宋书》卷一八《礼五》：“天子坐漆牀，居朱屋。……漆牀亦当是汉代旧仪。”同书卷六三《王昙首传》：高祖刘裕即位，平谢晦，欲封昙首等，“会燕集，举酒劝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又《南齐书》



图1 敦煌莫高窟第三二窟北壁壁画(初唐)



图2 五代卫贤《高士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的一幅，绘佛图澄为后赵皇帝石虎说法，佛图澄立于左，右设一床，床上设案，石虎的位置，正是“当案而坐”。壁画时代为初唐（图1）。五代卫贤所作《高士图》或者也可以引在这里，画中占据居室中心位置的是床，床两边设凳，床上一具栅足书案，案上放着展开来的书，书帙卷裹着的卷轴置于案足（图2）。所绘坐具与前举敦煌壁画正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当然《高士图》原有刻意求古的成分。

又有一种床，该算一般的坐具。《文苑英华》卷五一〇录崔融《耽书着床判》，前述事之始末曰：“孔安家贫耽书，一座数载不移，故穿床。邑宰以为惰农，遂蒙笞责。廉使谓高贤。”崔融自是廉使意见的赞成者，以为邑宰“徒有望于勤农，终致惭于励学”，此且不论，所谓“一座数载不移，故穿床”，是床乃坐具也。又《太平广记》卷三九录《广异记》中的麻阳村人故事，曰辰州麻阳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帟，或樗蒲，或弈碁，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云云。“牵牛蹊人之田”，是用着《左传》的典故，见《宣公十一年》。这里的“老人”原是河上公，“童子”乃王辅嗣，到了仙界聚在一处，《老子》的注释家便成了河上公的侍者。唐人笔下的志怪故事多充满人间烟火气，故事中的这一场景也是从生活中来，这里仍不妨援图作注。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时属晚唐的一幅，绘禅椅，绘衣桁，衣桁前面绘一张床，自是卧床，与它相对的两具小床，“床上各坐一人”，其情景与麻阳村人眼中所见似乎相差无几。此中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禅椅与坐具的床并行，然而坐姿无异（图3）。

卷二六《王敬则传》，云太祖亦即齐高帝成事之先，敬则从之谋废立，苍梧王事件中，至承明门，“随太祖入殿。明旦，四贵集议，敬则拔白刃在床侧跳跃曰：‘官应处分，谁敢作同异者！’”